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

FOREIGN HISTORIOGRAPHY ON MODERN CHINA
26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第二十六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30 号

责任编辑：丁如筠

责任校对：劳 定

封面设计：毛国宣

版式设计：王智厚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Guowai Zhongguo Jindaishi Yanjiu

第二十六辑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编码 100720 电话 404153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科技情报信息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75 印张 2 插页 270 千字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7-5004-1606-7/K·252 定价：11.00 元

- 凯文·P. 莱恩著《主权与现状:中国的香港政策的历史根源》
 彼得·韦斯利-史密斯(272)
 杜继东译
- 凯文·P. 莱恩著《主权与现状:中国的香港政策的历史根源》
 诺曼·迈因纳斯(274)
 杜继东译
- 近代改革者伍廷芳..... 万 燕编译(276)
- 从波茨坦到冷战:三巨头外交(1945—1947) ... 万 燕编译(278)

· 学术动态 ·

- 1992年日本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宫田道昭(280)
 张永江译 王士花校
- 日本中国近现代妇女史研究状况..... 石川照子(290)
 李 宏 陈曼娜译
- 外国在华机关公团名汇(十一)..... 黄光域辑(297)

历史演变的模式： 中国的国家与社会(1839—1949)

魏斐德*

我将要探讨的四种模式是：19世纪地方主义在东方专制主义条件下的发展及其向现代军阀主义的演变；同治时期儒学统治地位的恢复及其在国民党时期的再次出现；从晚清到20世纪50年代初地方精英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在这整个时期里国家权力对社会进程的渗透的不断加强。这四种模式与中国社会控制制度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可通过20世纪警察部队的形成得到验证。

地方主义·军阀主义·专制主义

这四种模式都将1839—1842年鸦片战争之后的这段时期作为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根本变化的开端。这一时期的农民起义和地方军事主义与一个世纪后的中国的相似之处，于20世纪30年代首先引起乔治·泰勒(George Taylor)的注意，当时他正在撰写关于华北军事冲突的著作；他论述清朝对太平军的反应的史书，后来在20世纪50、60年代对华盛顿大学的历史学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的“东方的专制主义”

* 本文为伯克利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魏斐德于1991年1月11日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所作的学术演讲稿，在翻译过程中作了删节。——译者

观点在泰勒的整个架构的背后隐约可见。乡绅只是国家的产物，尽管他们对君王提出的道德上的批评确实使他们起到某种制衡作用。然而，从本质上说，他们仍是君主制的附属品；他们的命运受科举考试的支配，他们的生活来源主要是靠作为士大夫的收入，而不是靠地租或采邑等更为独立的经济收入。

这种本质上停滞不变的历史因鸦片战争造成的社会、经济后果而改变。太平天国对闭关自守、讲究夷夏之辨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它促使旧体制开始瓦解。象曾国藩这样的“团练大臣”获准建立地方军队，而且对在通常情况下不许染指的地方财政来源也能加以控制。他们的幕僚继承了这些特权，成为一批独立的军事将领，并在20世纪初构成北洋军阀的核心。

因此，这种史学论点的中心大体是，清王朝为应付太平军的挑战，在19世纪60年代不得不兴建地方军队。而地方主义又导致军阀的出现，这便是清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当然，中国传统的乡绅也随着君主制的瓦解开始走向没落。

儒学的复兴

地方主义、军阀主义、专制主义模式远不如芮玛丽(Mary Wright)的儒学的继续复兴架构具有启发性，这一架构是从她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在哈佛费正清著名的专家讨论会上学到的“冲击—反应”结构发展而来的。芮玛丽的架构的出发点也是鸦片战争和太平军叛乱。她认为，象曾国藩这样的自强运动领导者，因受文化忠诚思想的影响要维持清王朝的统治。诚然，他们在地方上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官僚机构，但他们的儒家保守主义最终使他们效忠于现存的国家组织。

将政体与文化等同起来会造成两种后果。第一种后果是将满汉君主制存在的理由与从总体上捍卫传统联系起来，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致命的弱点。当帝国崩溃时，传统的儒家文化也就随之衰落。

政体与文化认同的第二种后果是,辛亥革命后,当传统文化因其与正在灭亡的旧制度的联系而遭到致命打击、前景黯淡时,保守的政治文化仍然比较顽强。芮玛丽在著述中认为,曾国藩思想中的这种“顽强的儒家思想”同样存在于蒋介石的政治哲学中。芮玛丽把蒋介石在“剿共”期间对付暴动的策略以及1934年新生活运动的原理与曾国藩的影响联系起来。因此,芮玛丽把国民党的保守主义看作是同治中兴思想的再现,并认为这完全是一个时代错误。芮玛丽在晚年越来越认为,整个中国近代史就是始于世纪之交的极为重要的革命浪潮。

在《革命中的中国》一书中,芮玛丽对中国官方史学著作中流行的关于孙中山对辛亥革命起了“国父”的关键作用的观点提出疑问。芮玛丽认为文化大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20世纪初的革命运动联系起来,她列举了当时中国出现的一些新生力量:妇女、青年、近代军队、工人,等等。这些力量而不是孙中山那样的海外华人宣传家——他们只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些致力于发动政变的力量——才是革命的真正动力。芮玛丽著作的另一个新观点——“乡绅革命”,当时远不如她对反对对孙中山的偶像崇拜所持的怀疑那样引人注目。“乡绅革命”的观点在张朋园对立宪运动所作的重要研究中得到有力的支持,这一观点对后来学者的影响要比她的反孙论或“新力量”论更为持久。

地方精英

德托奎维尔(De Tocqueville)把社会革命与在地方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精英和近代国家之间的各种竞争形式联系起来,在过去25年里这一直是美国历史社会学的一个重大再发现。在中国史领域里运用这个观点进行阐释的最有影响的学者是孔斐力(Philip A. Kuhn),他的“军事化论点”成为晚清史研究中引用最多的一种结构上的分析方法。通过对太平天国时期历史的仔细考察,孔斐力

不仅指出地方精英从叛军手里夺回了乡村,而且他还认为叛军和满清王朝双方都同时经历了一场社会军事化过程。此外,他还论证这种超国家的军事力量的扩大是国家与地方精英激烈竞争的一种表现,它们的竞争不仅为了现存的资源,而且还为了由人口统计需要和来自外国的竞争所产生的新的政治资源。

孔斐力还将地方精英的垄断与鸦片战争后在经世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开明的自利思想联系起来。正如孔斐力所指出的,士绅乡治或“地方自治”的观念使人想起17世纪的一个理想,即用开明的儒家士绅的“封建”的利害关系制约“郡县”国家的专制权力,这些儒家士绅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在19世纪末改革运动期间及其后出现的地方自治运动,至少可分为三种不同的形态。

乡绅自治形态

第一种形态是温和的、积极的地方自治政府,它由一群敏感的、致力于建立他们自己合法的公共政治职责范围的地方领导人发起。这就是伊懋可(Mark Elvin)在阐述本世纪初上海附近的地方精英的行政管理制度时所指的“乡绅民主制”。近年来,这种现象被兰金(Rankin)、罗(Rowe)和曼(Mann)看作是精英行动主义的一种引人注目的近代形态。精英行动主义伴随着一种新的自愿的公共服务领域的产生而出现,它甚至可以被看作是朱尔根·哈伯马斯(Jurgen Habermas)所谓的18世纪后欧洲社会中的“公共领域”。

地方自治的第二种形态要消极得多,与某些美国历史学家所认为的在19世纪末中国出现的市民社会相比,它更接近于东方专制主义的独裁特征。村松佑次(Muramatsu Yuji)对江南的厘税的研究表明,太平天国后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居民所承担的公共赋税和私人地租的界限日趋减弱,以致地主能够运用国家警察力量来逮捕抗租的佃农,强化他们的地租征收制度。深受村松著作影响的

詹姆斯·波拉切克(James Polachek)对苏州的研究证明,国家与社会精英统治之间的极度缺乏界限削弱了国家权力,并且增加了社会革命的可能性。

地方自治的第三种形态是,地方精英扮演反对政府的革命运动的组织者的角色。辛亥革命期间的地方立宪派领袖、城市改革者如谭延闿,后来在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者的统一战线中支持由毛泽东领导的青年激进分子。可是随着统一的民族主义让位给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城市精英内部的统一战线就开始分裂了。

传统国家的权力

明代开国者理想中的地方政府形态是一种自我管理的机制,由地方粮长无偿负责收税并履行其它一些重要职能。既然朝廷指望自给的征税者,那么控制机制也就不会太正规。

清王朝继承了朱元璋的关于最低限度插手地方管理的策略。为了取得中国东部的经济资源,清代头两个皇帝作出了极大的努力。这些努力大部分获得了成功,在中国前近代各朝中,乾隆时代的清朝国家在财政、军事和政治上都是十分强大的。然而,税收制度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私人垄断扰乱了水利系统,在18世纪50、60年代几乎阻塞了国家用于收取贡赋和进行贸易的水路。而18世纪70—90年代人口的增长给国家的政治资源带来各种重负,这在前面讨论孔斐力的军事化理论时已经提到。光绪末年,在1898年的“百日维新”失败后,国家权力的积弱具体表现为光绪皇帝在试图越过地方官员直接管理帝国民众方面所遭受的挫折。政府方面的动机是想使上下融为一体,以便加强自己的统治,但地方精英却认为这意味着承认他们有权参与被广泛分享的政治统治。

因此,对于20世纪初期陷入冲突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存在着两种明显不同的看法:一是国家希望加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直接联系;二是地方精英渴望能更多地插手地方政府的事务。

近代国家与社会控制

20世纪中国国家权力加强的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是近代警察制度的发展。袁世凯是华北地区新型欧式警察部队的主要创建者。在保定和天津采用近代警察制,既是为了安定人心,也是为督抚提供一种越过地方乡治势力的工具,而这些地方乡治势力直至那时仍控制着当地的民兵和乡勇。在北京,警察制度改革是根据日本1871年明治警察制度改革的精神进行的,并且有一批日本警事专家受聘在华担任教官。

在这些专家中,最著名的是川岛浪速(Kawashima Naniwa),他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担任中国警务学堂的总监,该学堂采用日本警察局的方法训练中国巡警人员。1902年,川岛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它成为日后警察制度改革方案的蓝本。他在其中还将军队和警察比作国家政治统治的两翼,这个比喻近年来变得十分流行。在备忘录中,川岛提议建立一支由中央控制的国家警察部队,它隶属警事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并由皇室成员担任首脑。

中国这个新的警察制度以欧洲大陆中央集权的警察制度为模式。1905年10月8日成立巡警部;1907年取消绿营军后,巡警部被合并到民政部。在民政部里,所有警察事务都归警政司管辖。将近20年后,警政司成了国民党内政部里蒋介石的秘密警察的机要管理核心。

国民党的警察制度改革

尽管日本模式和欧洲范例似乎已给中央集权制的前途提供了保障,但如果在这之前军队没有统一,仍很难把警察控制模式强加给中国。然而,直到30年代大陆法系专家对中国新的国家警察制

度的影响受到美国警官的挑战为止，欧洲的警察制度一直是中国效法的主要模式。例如，1930年，国民党内政部邀请伯克利加利福尼亚警署的A. S. 伍兹(Woods)警长来华担任顾问。

伍兹被请来帮助改组南京市警察机构，是因为作为世界上优秀的警察机构之一，伯克利警署声誉日隆，而这又应归功于其领导人奥古斯特·沃尔默(August Vollmer)。沃尔默同时也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执教，是伯克利的第一位犯罪学教授。沃尔默在任职期间培养了两位中国学生：鄞裕坤和于修浩(Yu Xiuhao, 音)他们后来均成了蒋介石的主要警察顾问。鄞裕坤于1932年在伯克利的犯罪学培训班毕业后回国，他私下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关于改革中国警察制度的计划。1933年3月，鄞被调到警察厅长陈焯将军手下任安全处“特别秘书”。鄞在任职期间引进了一批美国警务设施，包括无线电巡逻车、测谎器、指纹取样机、警犬，等等。未到一年，他又应邀担任浙江警官学校警察培训处主任。

浙江警官学校由朱家骅在北伐后建立，是新的国民党政权培训干部的第一批学校之一。作为国立教育机构的浙江警官学校也负责庐山的治安，那时庐山已成为国民党“剿共”的训练基地。特别干部大队则由蒋介石的秘密军事机构头子戴笠建立，为“军统”储备力量。浙江警官学校也是戴笠的军统人员的秘密培训中心。这些军统人员被蒋介石选作特别干部，用以接管地方警察力量，并将其纳入秘密警察系统。

1935年，当蒋介石宣布将浙江警官学校与江苏警官学校*合并成立中央警官学校时，戴笠手下的人已被安插在一些要害的政治培训部门。而一些特别秘密培训部门也已用来培养军统人员，这些人员中有的被编入蒋的私人卫队，有的成为情报人员，有的则充当秘密警察。培训他们时采用的课本是共产党叛徒提供的苏联“契卡”和政治保安部训练手册的中译本。

* 误，应为北平高级警官学校。——译者

包括陈立夫的“中统”在内的国民党的秘密组织，相当于共产党特务部和特务委员会属下的共产党地下活动组织。共产党特务部和特务委员会于1931年“红队”领导人顾顺章叛变之后成立。

1935年，蒋介石决定成立中央警官学校，这主要出于对全国警察制度更为深远的考虑，即将警察系统与控制地方的其它系统结合起来，使之与军队一起作为其政权的两大支柱。蒋介石对1937年毕业的中央警官学校学生说：“我国有两支主要的力量：军队和警察。一个保卫国家，一个维持治安，它们如同飞机的两翼。但是，由于现代警察任务的复杂性，也由于警察是唯一与公众经常接触的公职人员，因此，在我们的社会里，警察就显得更加重要。”*

蒋介石计划让中国所有的警察头目都到中央警官学校接受培训，但这一计划因日本侵华而流产。不过，秘密警察组织仍在继续扩大，这一方面是由于获取情报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戴笠与美国海军代表达成协议，决定成立中美合作所。由中美合作所提供来自联邦调查局和海军情报机构的教导员，帮助培训高级军统人员；由正规的陆、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军官训练戴笠的5万名“忠义救国军”。到太平洋战争结束时，蒋介石的军统局约有10万名特务，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情报机构和秘密警察组织之一。

节译自《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1991年，第11期。

崔志海译

（责任编辑：丁毅）

* 未查到原文，此处为意译。——译者

太平军的远方同盟军：1853—1855年 上海与广州的叛军及其同缔约国的 相互作用的比较研究*

黄宇和

—

1853年3月20日，太平军攻克了南京。9天以后，太平王入城，宣布它为天国的首都。这极大地鼓舞了沿海地区的对政府不满的人们。秘密会社纷纷拿起武器反对它们的政府，并在上海和广州这两个商业中心成功地发动了两次较大的叛乱。^① 在上海，叛军于1853年9月7日占领县城，直至1855年2月17日。在广州，叛军从1854年10月13日到1855年3月7日围困该城达5个月之久。可见，在太平军直接与缔约国接触之前（外国公使偶然访问除外），上海与广州的叛军每天必须与外国人打交道。因此，我不得不系统地阐明他们对洋人的态度。确实，这两座城市存在着当地叛军、缔约国、清政府和多少还包括太平军这4个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它们远比历史学家们到目前为止所设想的要复杂得多。1860

* 这篇论文是在剑桥丘吉尔学院的志趣相投的环境中写成的。我希望在此表达我对给予我友好和慷慨的帮助的该学院院长和研究人员的谢意。

① 应该指出：开放港口厦门的反叛者也占领了该城市，但这次叛乱远不如上海和广州的影响大。

年,当列强与太平军广泛地接触时,它们准确地知道该怎样做;而当时忠王李秀成正率兵攻打上海,他对他的洋兄弟却一无所知,或者说想法天真幼稚。

众所周知,1860年,缔约国放弃了早就宣布的在太平军反叛期间保持中立的政策,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所以,一般认为,此前列强曾忠实地遵守中立。然而,从来自有关当事人的响亮的抗议中可以看到,早在1854年列强在上海和广州就已给清军以非官方的物质上的支持。

中国历史学家一直谴责这一时期在中立伪装下的外国干涉,但这些谴责常常缺乏系统的证明。确实,笼统地指责帝国主义侵略往往会使问题过于简单化,并且会使之忽略对生死关头的利害关系的微妙作用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外国外交官远不是头脑简单的帝国主义者,而是熟练地利用局势来谋求自身利益的实用主义者。所谓“中立”一词,仅仅对那些教条主义者才会有那么点意义。

二

西方的资料表明,上海的叛军是秘密会社三合会成员——来自广东、福建两省的下层民众。^① 主要分为7个帮,而不是两个。^② 最有势力的一支的首领刘丽川被推为总首领。^③ 他是广州人,1845年在香港加入三合会,1849年来上海建立他自己的小刀会。^④

“下层民众”在西方资料中的意思是未受教育的劳动人民。但这些资料未能说明他们反叛的原因。一位中国著者将他们描写为

① 怡和书信文件集(Matheson Papers)B2/23, A. 鲍思孚致 D. 查顿(A. Perceval to D. Jardine), 1854年9月7日。

②③ 方诗铭:《上海小刀会起义》(上海,1965年),第25页。

④ 同上书,第23页。

由于沿海贸易衰败而造成的被迫背井离乡的失业水手。^①这种衰败是由清政府的沉重赋税和外国船只的侵入造成的。^②关于沉重的赋税,著者引证了当时的记载;^③但关于外国船只,著者只引用了间接的材料,并不令人满意。书中简单地引用了一个外国人的话:他1843年在上海看到的无数沙船到1848年已经不见了;据他统计,取而代之的外国大船共有26艘。^④但是,从事国际贸易的船只不应与那些从事沿海贸易的沙船相混淆。著者未能明确指出的是,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人已在竞争中成功地击败了从事沿海贸易的当地航运业。^⑤失业的水手会集在两个主要的通商口岸——上海和广州,加入那里的秘密团体(如果他们在这之前还不是其成员的话),并且最终走上反叛的道路。

刘丽川在占领上海县城当天对一些前来采访的外国人说,他听从太平王的命令,并与太平王建立了直接的联系。^⑥显然,这仅是一个声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太平军与上海叛军组成的小刀会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刘丽川在那天发布的告示中提出了“反清复明”^⑦——典型的三合会口号。数日之内,上海周围的城镇相继发生叛乱。^⑧不到一个月,刘上书太平王称臣并改用太平天国历法。^⑨这封信一式两份送往南京,一份通过陆路,一份通过水路。经由水路的那份被清军截获,而经由陆路的那份是否最后被送到目

① 同上书,第17—18页。

② 同上书,第18页。

③ 姚际唐:《避氛后集》,载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编《上海小刀会起义资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上海,1959年),第867页。

④ 方诗铭前引书,第18页。

⑤ 详见费正清(J. K. Fairbank):《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哈佛大学出版社,1953年),第311—346页。

⑥ 《字林星期周刊》(North China Herald),第163期(1853年9月10日)第22页。

⑦ 刘丽川告示,载《汇编》,第4页。

⑧ 方诗铭前引书,第41—43页。

⑨ 刘丽川致天王,载《汇编》,第11—12页。